

试析周作人 1930 年代与 1940 年代遗民话语的差异性

万 杰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内容摘要】在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途中, 遗民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 但在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 遗民文化以不同的面目呈现, 通过解析周作人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遗民话语的差异性可以窥得周作人的思想内核及其后期思想的变迁。

【关键词】遗民 气节 生活情趣 心理危机

中图分类号 J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1-0102-02

一

周作人于 1932 年至 1937 年抗战爆发数年时间内写下为数不少的谈遗民与遗民著作的文章。在那样一个民族命运风雨飘摇的年代, 周作人如此集中地阅读遗民著作显然有他的思考。遗民著作是周作人窥察乱世情形的一个窗口, 而谈遗民及其著作的文章明显较多则表明周作人对时势的预测: 一场外乱即将来临。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有感于民族危亡, 同清末民初的革命派一样, 再次想起了明代的亡国, 明代遗民、忠义的事迹再次被宣传以鼓舞民族情感。周作人对遗民文化的解读, 不同于同代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清末的革命派、改良派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解读遗民文化。清末的改良派取遗民文化中的批判封建专制的思想, 革命派及与周作人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取的是遗民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和气节观, 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的具体性、丰富性往往被忽视。而周作人谈遗民的文章着重展现的正是遗民思想与生存的真实性、多样性。这种解读方式显然与周作人坚持的个人主义人间本位主义思想和其解读遗民文化的目的有关。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说遗民必举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著名的遗民思想家, 一般人对遗民的印象也主要来源于他们。但 30 年代的周作人谈遗民却很少以他们为例, 甚至很少提及。顾炎武有所提及却被周作人认为道学气十足而表示不屑, 王夫之的名字似乎从未出现在他的文中。其中原由周作人的这段话也许可作说明: “傅青主是明朝遗老, 他有一种特别的地方。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王山史也都是品学兼优的人, 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正统派的, 总不能出程朱陆王的范围。颜习斋刘继庄稍稍古怪了, 或者可以与他相比。”^{[1][2]}可以归入周作人的非正统派遗民的还有张岱、王思任、朱舜水、陈章侯、叶天寥、贺贻孙等。遗民中的非正统派正是此时周作人欣赏的对象。非正统派的主要特点当是思想上反对程朱陆王, 宽博通达不

狭隘。周作人取舍遗民的标准与他评价普通中国读书人思想的标准没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没有因为遗民具有民族精神和气节而无视他们真实的思想。作为遗民群体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为世人最为看重的品格: 民族气节, 在周作人这里成为次要标准, 至多是与思想标准处于同等的地位, 也就是说周作人取的是思想与气节兼具者。

周作人对民族主义、气节观保持警惕, 他谈遗民思想的热情更多于谈民族气节。周作人拒绝使用“逆胡膺虏, 非我族类”(章太炎语)和“夷夏之防”类的词汇与话语模式, 显然从前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的理想虽然破灭, 周作人也很难再有清末民初时的民族主义激情了。甚至在日本侵略中国已成事实之时, 他还一厢情愿地理解为中日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解, 甚至不忍心用“侵略”一词指称日本对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他多次在文中指出偏激气节论的流弊而将气节化为个人理性的行为选择。周作人对偏激气节论的批判与他对忠义的非议联系在一起。对忠义即为国殉身者, 周作人没有多少好感, 认为是偏激气节论下的产物, 屡次在文中引用颜习斋和洪允祥的话进行批评。

在政治宣传中, 遗民被抽象为民族气节的符号, 其真实的生存生活状态常被忽视, 而这却是周作人非常关心、想要窥察的一个方面, 作为个人主义人间本位主义的信仰者, 现世生命和生活状态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叶天寥、贺贻孙、陈章侯等普通遗民的著作是周作人了解遗民生存状态的途径, 唯其普通, 其生存生活状态才真实也许是周作人选择他们的原因。周作人从遗民著作中看到了遗民贫病困苦的生存状态。而那些历尽劫难、贫苦度日的遗民身上还存留的对生命生活的珍惜留恋和洒脱的性情让周作人很为感叹。《甲行日注》一文中周作人说: “日记叙述隐居生活颇为详尽, 今抄录数节, 可以见其困穷与闲适之趣。”^[2]然后引用了几条日记如“初七日乙酉 晴。夜金五云持酒一坛大蟹六只至。六人各食一蟹, 余已无他, 亦自不俗也。”^[2]“初十日丁巳 晴。初

* 本文为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 作者简介: 万杰, 女,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

闻黄鹂声 犹忆离家日听雁声也。物换星移 动人感深矣。”^[2]“十七日丙辰 晴风。夜中偶起 似可三更时分也。流薄岸 颓萝压波 白月挂天 萃风隐树。四顾无声 遥村吠犬 鱼棹泼刺 萤火乱飞 极夜景之幽趣矣。”^[2]而后周作人感叹道：“清言俚语 陆续而出 良由文人积习 无可如何 正如张宗子所说 虽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2]

明遗民生活的贫苦状态与他们家业的丧失和无谋生之技的客观原因有关,而他们思想情感上的自愧自责以及自虐亦是个中原因,他们认为贫困生活的折磨是自己应得的报应。周作人忽略那些了无生趣更无情趣的遗民,而独取叶天寥、贺貽孙这样尚残留一些生命情趣的遗民,很可见出周作人的思想价值取向。即使在艰难的时世情境中也不能丧失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和对生活的情趣也许是周作人想要对自己说的。

二

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周作人对遗民文化的态度有一明显变化,即对正统派遗民的接近,此前周作人亲近和欣赏的是他所谓的气节与见识兼具的遗民,而对正统派遗民尤其是有道学气的遗民他是敬而远之甚至加以冷嘲热骂的。而到了40年代他忽然也“正统”起来,甚至以顾炎武自居,似乎忘了此前对他的厌恶。《苦口甘口·自序》中周作人引用了顾炎武致黄梨洲的书信中的一段话“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篲,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3]然后周作人说“案此书亭林文集未载,见于梨洲《思旧录》中,时在清康熙丙辰,为读《明夷待访录》后之复书,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则六十七矣。黄顾二君的学识我们何敢妄攀,但是在大处态度有相同者,亦可无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但所取材亦不废虫鱼风月,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3]周作人试图构建忧国忧民的自我形象,他称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不是纯粹文人,他的文章可取处主要在思想,可能属实,但说自己向来用意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则实在不知所云,他自己显然也觉得此前的一些闲适类文章无法包括进去,就说“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20、30年代,周作人喜欢的都是张岱、王思任、傅山类思想明达,不拘儒家教义的“非正统”思想的遗民,正是想暗示出自己的特点,而于40年代这类遗民的名字已很少出现于周作人的文章中,周作人转而与顾炎武、黄宗羲类遗民思想家亲近了。从前的一个有着深刻时代苦闷和自我命运忧惧的凡人忽然高大起来,成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了,但自我幻觉中的高大、自我膨胀,恰恰显示的是周作人内心深刻的心理危机。

40年代周作人在《道德漫谈》、《新文学的前途》、《汉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等文章中对中国的思想问题进行梳理。他指出儒家思想有饥寒由己和民以奉君,即为人民与为君父两派或说两个段落,不幸的是后者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意见周作人在同时期的诸多文章中作了重复论述“据我的意见来说,关于政治道德中国本来有两种绝不同的思想,甲种早起,乙种后来占了势力,可是甲的根本深远,还时常出现,于是成了冲突。简单的用假定的名称来

说,这可以说甲是一切都为人民,乙是一切都为君主的主张。”^[4](P20)周作人自称这一意见与黄宗羲的思想有相合处,黄宗羲在明亡后进行政治反思,由对明代君主行为缺失的思考进而走向对君主制的置疑,但因时代关系,黄宗羲和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一样都把目光投向古代,希望回归原始儒家精神和古代为君之道,所以他希望的还是一个完全为民的禹稷类型的君主。周作人作为一个受过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仍作出与明遗民类似的思考,只能让人慨叹中国历史的轮回不前。

30年代的周作人与时代主潮远离,不与当局合作,即使内心关心国家民族问题,生存方式还是形同遗民,而其隐逸的表象在当时使许多人把他当作隐者,他自己对隐者也颇具同情,并否认隐者思想消极之说。到了40年代周作人已然成为伪官僚机构中的一员,身份的转移已使他不满足于隐者的独善其身。在《道德漫谈》中周作人把孟子“禹稷颜回同道”的思想概括为“饥寒由己,民以奉君”两种观念的掺合,本来孟子的意思即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固能“为民”,“独善”则非为君也,而更接近道家隐逸,而周作人则认为“独善”即为君,大概不能为民即是为君的意思了。周作人进而指出饥寒由己的仁政是“儒家的大乘派”。“民以奉君”把“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小乘总是无可疑的了。”^[4](P56)此时期的周作人屡次于文章中表示自己信服大乘普渡众生的佛教精神,显然是以大乘一派自许。在他的逻辑里,他40年代的行为选择是一种追求事功,真正为民的精神的体现,独善于民是无益的,而他是禹稷的后学,是大乘的信徒和奉行着。只是不知他为什么不在此前奉行事功,以救民众于灾难来临之前?20、30年代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五四遗民,忧民与忧己兼具,时局日紧而苦闷日甚,而40年代的行为显然未接续他一向的形象。周作人用大乘自我牺牲普救大众的精神暗示自己的行为选择意在牺牲自我以普救大众于国难,这与他一向的精神有悖,尽管此前的周作人可以说是中国一位很具深度的思想家,但也不是这样“无己”的“伟大”,40年代的周作人只怕是投身饲虎(非佛学意义上的)有之,利己有之,而普渡众生就不知从何谈起了,他的作用只在于使周作人在幻觉中进行自我慰藉。

30年代周作人的许多文章特别是涉及遗民及其著作的文章中包含着深刻的苦闷,而苦闷中有他真诚的忧国忧己之心。那种渺小的自我个体面对历史命运的宿命感,具有深沉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到了40年代,周作人的文章则显得平静甚至是麻木(有人认为是近于炉火纯青的境地了)。明遗民周亮工有言“余谓士君子,不幸而当患难,笔砚便当焚却,怨怼固足鼓祸,和平亦是矫情。”周作人文章的平静是因为内心有大痛苦不敢触及也。而其生命的悲剧性不是平淡的语言所能掩饰的。

参考文献:

- [1]周作人.风雨谈[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周作人.夜读抄[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3]周作人.苦口甘口[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4]周作人.药堂杂文[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